

Vanberg, V.J. Schumpeter and Mises as 'Austrian Economists'. *J Evol Econ* **25**, 91–105 (2015).

熊越 译

本文仅供研究使用，不一定代表译者观点

作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熊彼特和米塞斯

维克多·J. 范伯格 (Viktor J. Vanberg)

弗莱堡大学

布赖斯高地区弗莱瓦尔特·欧肯 (Walter Eucken) 研究院

约瑟夫·A. 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 1883-1950) 和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 是否——以及如果是，在何种意义上——可以都归类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就他们的生平背景而言，他们当然是奥地利国民，而且，作为庞巴维克 (Böhm-Bawerk) 和冯·维塞尔 (von Wieser) 的学生，他们都有资格在形式的意义上成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成员。然而，他们是否也在实际的意义上也同样有资格更值得考虑。他们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之间的明显差异经常被引用作为范式分歧的证据，一方面，米塞斯是门格尔遗产的真正信徒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现代复兴的主要启发者，另一方面，熊彼特是一个背离奥地利学派范式的基本原则的叛徒。虽然这种观点长期以来在经济思想史学家中占主导地位，但米塞斯的学生伊斯雷尔·柯兹纳 (Israel Kirzner) 和其他人最近呼吁重新评估熊彼特在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传统中的地位。本文的目的是仔细研究熊彼特和米塞斯的著作中的共性与分歧，这些共性与分歧导致了对其“奥地利学派”资格的矛盾评价。第一节对他们共同的维也纳背景和不同的个性进行了一些评论，第二节着眼于米塞斯和熊彼特各自的方法论观点，第三节对比了他们在社会主义计算问题上的论点，第四节比较了他们在企业家精神 (entrepreneurship) 上的观点，第五节得出一些结论。

1. 奥地利根源与不同的观点

人们经常观察到，虽然熊彼特可能被归类为“奥地利学派的第三代成员，与米塞斯共享‘奥地利学派的’背景和培训” (Keizer 1997: 78)，对其“奥地利性 (Austrian-ness)”也存在怀疑 (同上)，许多作者都评论了熊彼特与其奥地利学派根源的矛盾关系 (例如 Böhm 1990: 202; Hébert 1990: 190, 199; Salerno 1999: 40ff.; Festré: 2002)。F.A. 哈耶克 (F.A. Hayek, 1992: 160) 表达了一种被广泛持有的观点，他指出“虽然他在维也纳大学接受过培训，并且一直是著名的欧根·冯·庞巴维克研讨会的主要成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熊彼特“离奥地利学派的特色信条越来越远，以至于后来他是否仍然可以算作该组织的成员变得越来越令人怀疑。”

哈耶克提到的“著名的研讨会”发生在 1905 年和 1906 年，其主题是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的著作。正如熊彼特传记作者 R.L. 艾伦 (R.L. Allen, 1991: 39) 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次非凡的研讨会，不仅因为庞巴维克处于他的权力巅峰，而且还因为学生的素质。”除了米塞斯和熊彼特，这个

小组还包括“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同上）奥托·鲍尔（Otto Bauer），他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时充当了庞巴维克的主要对手（Hayek 1992: 138f.）。¹

在这次研讨会上，米塞斯和熊彼特的对比立场浮出水面，这种对比显然源于他们不同的个性，不亚于他们在方法论和理论问题上的实质性分歧。正如 Allen (1991: 39) 所观察到的：“熊彼特在庞巴维克研讨会上的行为体现了他后来在课堂上和讲台上的态度。他以悖论者（man of paradox）的身份出现。人们永远无法确定他站在哪里。他真正相信的是什么？……他养成了玩弄观念的风格，现在争论它们的优点，后来又恶毒地攻击它们。”²相比之下，正如哈耶克 (1992: 156f.) 所说，米塞斯“完全缺乏他出色的研讨会同伴约瑟夫·熊彼特的适应性，他总是迅速适应当前的知识分子时尚，也完全没有熊彼特那种让资产阶级惊叹（*épater le bourgeois*）的趣味。”我们可以假设，在庞巴维克的研讨会上，米塞斯采取了坚定而明确的立场，这将成为他的标志。一年前，他阅读了门格尔的《国民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Mises 1978a: 33），这为他在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奥地利学派式”和古典自由主义观点奠定了基础，他将在他的余生中坚定地推动这些观点。哈耶克 (1992: 139) 认为，正是在庞巴维克的研讨会上，“奠定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志性观念的基础。”

参加庞巴维克的研讨会很可能是这两位经济学家之间最密切的互动。即使在他们一起在维也纳度过的那段时间里——米塞斯一直呆在维也纳，直到 1934 年搬到日内瓦，熊彼特在 1906 年完成博士学位后，在 1932 年加入哈佛大学经济系之前只在维也纳住过一段时间——他们似乎没有更密切的接触。当米塞斯被认为是波恩大学公共财政学教授的候选人时，他们的职业道路只交叉过一次，而且只是间接地交叉，最终，熊彼特于 1925 年被任命为该职位。³从米塞斯 1940 年移民到 1950 年熊彼特去世之间，他们都生活在美国的这十年中，也没有任何报道显示他们之间发生过深入接触。

经常被注意到的他们之间的性格差异，⁴一方面是熊彼特的“玩弄观念”以及“他对悖论和震惊他人的热爱”（Keizer 1997: 79），另一方面是米塞斯对其理论和政治信念的不妥协追求，⁵不仅可以解释这两位奥地利经济学家之间的

¹ Mises (1978a: 39f.) 就研讨会报告说：“鲍尔和庞巴维克之间的讨论充满了整个冬季学期。鲍尔的聪明才智令人印象深刻；他是大师的对手。”

² Swedberg (1991: 15) 引用了研讨会的一位参与者，他谈到了熊彼特参与讨论的“有趣的方式”。Allen (1991: 39) 指出熊彼特在研讨会上的作用：“马克思主义者没有让他皈依，但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也没有说服他。”

³ 作为米塞斯未能获得波恩教员支持的一个原因，Swedberg (1991: 69) 指出，他“被指责过于沉迷于自己的想法，以至于无法与经济学中的其他观点联系起来。”——另见 Allen (1991: 203f.)。

⁴ 更多参考资料参见 Keizer (1997: 79, 89)。Swedberg (1991: 11f.)。

⁵ Böhm (1990: 209) 谈到“米塞斯终生反对一切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东西”和“他对自由主义的不妥协支持”。

明显距离，⁶在解释他们各自观点之间的同意与否的特殊混合（这是以下部分的主题）时，也必须将它们考虑在内。

2. 方法论个人主义与经济力学

关于“方法论个人主义（Methodological Individualism）”的第六章是熊彼特的第一本书（Schumpeter 1908）中唯一被翻译成英文的部分。它于 1980 年，⁷也就是他去世三十年后，作为专著出版。哈耶克在该版本的序言中（Hayek, 1992: 160），将这篇文章描述为熊彼特早期著作中“仍然完全是门格尔式的一章”，并且是“对他后来放弃的观点的经典阐述”。⁸正如哈耶克（同上：161）所推测的那样，熊彼特不愿继续出版他的第一本书，⁹更不用说翻译它了，因为他“不愿意去分发一部分阐述了他不再相信的观点的作品，这是可以理解的。”¹⁰

尽管他在 1908 年的著作中以“认同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立场”（Perlman 2003: 167）收尾，但熊彼特在其中倡导的“纯粹经济学”概念更能反映洛桑学派的精神，而不是门格尔传统的精神。正如他在本书的最后一章中描述的那样，他的努力是关于“理论经济学赶上技术科学”。¹¹用 R. 斯威德伯格（1991: 24）的话来说，熊彼特的雄心是“在数学的帮助下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成为一门可以“与化学、物理学和其他真正的科学相提并论的”科学。与经济学作为一种人的行动科学的“奥地利式”概念及其方法论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征结合相比，熊彼特的“纯粹经济学”关注“经济数量”之间的关系，相比人类意志的主观性，这些关系可以以“客观”的方式进行研

⁶ Hayek (1992: 157) 在他上面引用的关于米塞斯和熊彼特之间差异的观点中补充道：“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两位最重要的代表是第三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几乎不可能将熊彼特视为狭义的奥地利学派成员），尽管在知识上相互尊重，但双方都感到紧张。”

⁷ 该章节由布鲁塞尔欧洲研究所出版，标题为《方法论个人主义》。

⁸ Hayek (1992: 160): “他的许多学生会惊讶地发现，宏观经济学的狂热者和计量经济学运动的联合创始人曾经对奥地利学派的‘方法论个人主义’进行了最明确的阐述。”

⁹ 1970 年，原出版商 Duncker & Humblot 重印了 1908 年的书 (Schumpeter 1970)。——在 Wieser 和 Böhm-Bawerk 的推荐下，该书已被维也纳大学接受为熊彼特的毕业论文，尽管 Wieser 和 Böhm-Bawerk 对其内容都有一些疑虑 (Perlman 2003: 167)。——事实上，正如 Salerno (1999: 41) 所报道的那样，“Böhm-Bawerk 对 Das Wesen 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他正确地认识到其理论方法是多么强烈地反门格尔主义。”特别突出的是 Böhm-Bawerk 后来与 Schumpeter 就利息的性质展开的争论 (Swedberg 1991: 14; Salerno 1999: 41)。

¹⁰ 根据 Perlman (2003: 176) 的说法，Schumpeter 后来承认“这本书让他非常尴尬。”——另见 Swedberg (1991: 31)。——关于 Schumpeter 1914 年的书 Perlman (2003: 174) 指出，当它“出版时，维也纳经济学界的其他人可能将其视为熊彼特打破了门格尔传统，因为门格尔传统已经与庞巴维克一致。

¹¹ Schumpeter (1908: 607): “让我们来谈谈它的全部内容：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理论经济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联系 (Sagen wir gleich, worum es sich handelt: Um den Anschluss der theoretischen Ökonomie an die technischen Wissenschaften im weitesten Sinne des Wortes)。”——另见同上：611ff.

究，就好像从机械的角度来看一样。¹²对于熊彼特而言，正是研究这些“经济数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才使理论经济学变得“科学”。¹³

有人指出，熊彼特自称对瓦尔拉斯的钦佩¹⁴——他称赞瓦尔拉斯的“在相互依赖的数量系统中定义（静态）均衡的方程组”是“经济理论的大宪章”（Schumpeter 1954: 242）——已经这可能源于他对科学的实证主义概念以及他对“数理经济学的科学严谨性和力量”的信念（Keizer 1997: 88）。¹⁵也有人指出，他对瓦尔拉斯方程组的钦佩和他对一般均衡理论的迷恋不仅与他自己的文字的理论风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而且与他自己对静态分析的局限性的强调和他的经济动态的演化方法形成了明显的对比（同上：75）。¹⁶无论这些“奇怪的异常现象”（同上：88）的背后原因是什么，在他的维也纳环境中，提倡一种本着瓦尔拉斯精神并以物理学等科学为模型的经济学无疑是吸引注意力的有效方法，而熊彼特的有据可查的“爱震惊他人”，可能是有助于解释其作品中如此明显的不一致之处的一大原因。

重要的是，米塞斯选择“人的行动”作为其巨著的英文版标题，而不是“经济学”，后者本来是德语原版标题“Nationalökonomie”的直接翻译。与熊彼特的瓦尔拉斯倾向相反，米塞斯（1978a: 36）宣称：“区别奥地利学派，并赋予其不朽名声的正是这一事实：它创造了一种经济行动的理论，而不是经济均衡或非行动的理论。”他补充说：“因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一种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熊彼特不属于奥地利学派。……对他来说，经济学是一种关于‘经济数量’的理论，而不是关于人的行动的理论”（同上）。特别是，米塞斯拒绝了均衡理论的机械类比，因为它与奥地利学派强调寻求优势的和探索性的人的行动——推动经济变化持续过程的持续动力——不相容。正如他说：“因为在人的行动领域中不存在常数关系，所以不能使数学交易方程为实际问题服务，就像力学方程通过使用经验确定的数据和常数解决实际问题一样。”（同上：58）。出于同样的原因，他拒绝接受通过处理统计总量经济学可以证明其科学地位的信念，这种信念肯定激发了熊彼特在建立计量经济学学会中的作用。

¹² Hayek (1948: 90) 注意到熊彼特对经济现象的“实证主义”观点：“在他看来，这些现象相应地表现为客观给定的数量和商品直接相互影响，似乎几乎没有人类思想的任何干预。”

¹³ 正如 Kirzner (1976: 69) 评论的那样：“尽管他的前辈们已经逐渐将经济学的概念作为人的行动的一个方面推进，但熊彼特发现有必要谨慎地将人的活动排除在经济调查之外。熊彼特的经济学观点是有意识地从力学的角度看待经济事务。……在经济学中，熊彼特解释说，我们有商品的‘经济数量’，这些商品经过相互决定的变化，可以通过数学函数来表达。……正是所有这些量之间存在这些函数关系，才使经济科学成为可能。”

¹⁴ Swedberg (1991: 15)：“在熊彼特的眼中，瓦尔拉斯一直是‘所有理论家中最伟大的’，他认为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定理是经济理论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¹⁵ Caldwell (1997: 4) 指出，Schumpeter (1954: 827) 称赞瓦尔拉斯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伟大的”，“这本身就足以将他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万神殿中剔除”。

¹⁶ 这已经是熊彼特的第一本书 (1908: 614ff.) 中的一个主题。在第 621 页，他指出：“实际上只存在于今天的经济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系统，如力学，但不谈论发展，如生物学”（“die Ökonomik, die wir heute allein wirklich besitzen, gibt uns ein System, wie die Mechanik, erzählt aber nicht von Entwicklung, wie die Biologie”）。

鉴于他们方法论观点的差异，这一点似乎令人惊讶：熊彼特和米塞斯都坚持将经济理论与心理学严格分开。诚然，正如柯兹纳（1976：69）所指出的，熊彼特宣称“理论经济学独立于心理学”（Swedberg 1991：27）与他“对‘财货数量’的非个人变化的强调是一致的。”¹⁷相比之下，在米塞斯的情况中，人们可能会认为他对经济学作为人的行动（action）科学的强调，表明与作为研究人的行为（behavior）的学科的心理学的关系有更密切的关系。导致米塞斯在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划出一条严格界限的是他独特的先验方法论，根据该方法论，经济理论不是从关于人的行为的经验心理学猜想出发，而是从“行动的先验范畴”（Mises 1978b：41）出发。经济理论的基础是“行动学”或“选择逻辑”，因此米塞斯坚持认为，由于其“先验推理”（Mises 1990：29），行动学与心理学严格分开：“行动学处理选择与行动及其结果。心理学处理决定各种选择的具体性的内部过程”（同上：21）。¹⁸

3. 社会主义的计算问题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于1920年的文章《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经济计算》（*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¹⁹掀起了“社会主义计算辩论”。对于其米塞斯声称的一篇文章：“我已经证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经济计算是不可能的”（Mises 2002：351）。²⁰米塞斯的主要论点是，通过生产资源的集体所有权，社会主义消除了市场，在市场中，潜在用户之间的竞争决定了这些资源的使用目的。米塞斯总结说，如果没有自由交换体系中的这种竞争，就无法知道在特定用途中使用资源的机会成本，因为机会成本，即从最有生产力的替代用途中获得的收益，只能在那些知道更好用途的人可以在资源使用权方面出价高于其他人的地方变得可见。正如米塞斯（1935：111）所说：“没有自由市场，就没有定价机制；没有定价机制，就没有经济计算。”换句话说，在缺乏揭示机会成本的机制的情况下，就无法在将资源用于最有生产力的用途的意义上实现资源的“合理”分配。“只有在黑暗中摸索”（同上：110）。²¹

¹⁷ Kirzner (1976: 70): “当然，熊彼特的观点与他希望忽略人的行为（behavior）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因素是一致的。将人的行为留给心理学家，经济学家只是根据商品数量和价格的相关变化来检验行为的结果。”

¹⁸ 以下引自米塞斯的《人的行动》（1949），将他的经济学观点描述为一门行动科学：“所有行动学和经济推理的起点都是人的行动的范畴”（同上：67）。“人的行动学的范围是对人类行为范畴的解释。演绎所有行动学定理所需要的只是了解人的行动的本质”（同上：64）。“它的陈述……就像逻辑和数学的陈述一样，是先验的。”——关于米塞斯关于“行动学”的先验地位的论点的批判性讨论及其更普遍的方法论观点，参见 Vanberg (1975: 85ff.; 2004 158ff.)

¹⁹ 最初的德语文章出现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Mises 1920）中。英文翻译出现在 F.A. Hayek (ed.) 1935: 87-130。

²⁰ 米塞斯以这一主张开始了后续文章《对社会主义经济计算问题的新贡献》，该文章最初于1923年以德语发表。在本文英文版的编辑脚注中，发表于 Mises (2002: 351ff.)，R. M. Ebeling (ibid.: 351) 指出：“当这篇文章在排版时，米塞斯在通信中指责约瑟夫·A. 熊彼特（《档案》的编辑之一）试图在未经米塞斯许可的情况下更改部分文本。”

²¹ Mises (1935: 130) 明确指出，他的论点不能决定是否应该采用社会主义的政治问题，因为

尽管熊彼特没有直接参与由米塞斯的判决引发的“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但他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一书中就这个问题发表的观点在对该辩论结果的普遍看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之前的两篇出版物中，熊彼特已经讨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可行性问题，首先，在一篇关于“今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的论文中，本文于1921年和米塞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计算”的文章发表了在同一期刊上，其次，在其著作《货币的本质》（*Das Wesen des Geldes*, Schumpeter 1970: 88-107）的第四章“社会主义共同体的经济计算（*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中，这本书是熊彼特于1925年至1932年在波恩期间写的，但到了1970年才首次出版。在这些贡献中，熊彼特与米塞斯相反，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可以运转，²²他的论点本质上基于一些假设（这些假设将在他后来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的更详细论述中发挥核心作用），即假设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中央计划当局掌握了将资源用于最有生产力的用途所需的所有知识，而这些知识正是米塞斯认为在没有生产要素市场的情况下就不可能拥有的（Chaloupek 2003: 250）。

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第十五、十六章专门讨论了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经济逻辑”问题。第十五章（Schumpeter 1950: 165）的第一句话是：“社会主义可行吗？当然可行。”在第十六章的开头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的纯逻辑是否有任何错误”（同上：172）的问题，并告诉读者，与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的否认相反，“答案是肯定的。社会主义的纯逻辑没有错”（同上）。为了支持这一坚定的判决，熊彼特断言，在他设想的那种社会主义制度中，“有可能从其数据和理性行为规则中得出关于生产什么和如何生产的独特决定”（同上。）因为这些数据和规则“所产生的方程……数量足以唯一地确定问题的未知数”（Schumpeter 同上）。熊彼特认为，经济学家恩里科·巴罗内（Enrico Barone）为这一断言提供了证据，他向“想要严格论证”的读者推荐了他的论点（同上：173）。²³尽管他承认他对社会主义计划合理性

它可能因其他原因而得到辩护，例如“道德理由”。但是，米塞斯（同上）在他的文章中总结道：“期待社会主义的合理经济制度的人将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²² März (1983: 62) 在参考 Schumpeter (1921) 的文章时指出，当时奥托·鲍尔 (Otto Bauer) 得到了他曾经认为是对立阵营的某个人的支持，这一定让他感到惊讶。——在 *Das Wesen des Geldes* 中 Schumpeter (1970: 104) 断言，“至少在逻辑上”，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理性计算是可能的（“Wir sehen also, dass rationale Wirtschaftsrechnung ... auch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zum mindesten logisch, durchaus möglich ist.”）。

²³ Enrico Barone 的文章《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长》（“Il Ministro della produzione nello stato collectivista”）发表于1908年的《经济学家期刊》（*Giornale degli Economisti*）。F.A. Hayek (ed.) 1935年出版了英文版《集体主义国家中的生产部长》。——在他的《经济分析史》（*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Schumpeter (1954: 987ff.) 中评论巴罗内的贡献：“巴罗内的表现包括简而言之：在按照瓦尔拉斯线提出了描述私有财产经济中纯竞争条件下的经济均衡的方程组之后，他为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经济写下了类似的方程组。……巴罗内或任何类似调查的基本结果是，对于任何中央控制的社会主义，都存在一个方程系统，该方程组拥有一组唯一确定的解决方案，与完全竞争的资本主义具有相同的意义和相同的资格。”

的论证假设“经济生活是一个平稳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切都被正确地预见和重复，没有任何事情会扰乱计划”（同上：178），但他还是匆匆忙忙地补充说：“如果我们超越平稳过程理论的范围，并承认行业变化所附带的现象，不会出现太大的困难”（同上）。此外，正如他声称的那样，成功地清除了“第一个障碍——社会主义计划的逻辑确定性和一致性之后，”（同上：184f.）熊彼特也准备好“解决下一个”，即它的“实践上的不可能”，据他说，“目前看来，大多数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在接受了纯粹逻辑问题上的失败之后，倾向于退休”（同上：185）。正如他断言，他对社会主义计算的“理论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建立了一种逻辑可能性，而且在此过程中也表明了这种可能性在实践中实现的步骤”（同上）。

如前所述，尽管熊彼特并没有直接参与社会主义计算的辩论，但正是他的权威性判决，即“反社会主义者”（他指的是米塞斯和哈耶克）已经被击败，在巩固经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共识方面变得非常有影响力（Keizer 1997: 77; Böhm 1990: 210; Lavoie 1985: 13）。²⁴在对熊彼特对这个问题的处理的批判性评估中，哈耶克（1948: 90）称他为“帕累托和巴罗内‘解决’社会主义计算问题这一神话的原作者”。哈耶克（同上：89ff.）指责熊彼特“掉入了一个陷阱，这个陷阱是‘数据（datum）’一词的模糊性给粗心的人设置的”（同上：91），即假定被称为“数据”的信息只是“提供”给社会主义计划当局。然而，哈耶克（同上）坚持认为，“假设所有知识都以我们作为解释经济学家的方式提供给我们的方式提供给一个单一的头脑，就是假设问题不存在，并无视现实世界中所有重要和重要的东西。”现实世界中的实际问题出现了，用哈耶克（同上：90f.）的话来说，正是因为可能“提供”给计划当局的“数据”“从未如此提供给一个人，因此，在解决问题时，必须使用分散在许多人中的知识。”然而，正是这个问题，即使不像哈耶克后来的叙述那样明确说明，也是米塞斯最初论点的核心，即由于缺乏生产资源的竞争性市场，社会主义计划者无法获得只有真实市场价格才能提供的机会成本知识。²⁵

在对社会主义计算辩论的仔细分析和重新评估中，唐·拉沃伊（Don Lavoie, 1985）揭示了这一神话——即哈耶克后来关于“知识问题”的论点“与米塞斯有本质区别”，构成对接受“理论可能性”的退却，但否认社会主义的“可操作性”——背后的误解（同上：14）。²⁶正如拉沃伊所说，从一开

²⁴ Swedberg (1991: 215) 引用了一封写给戈特弗里德·哈伯勒（Gottfried Haberler）的信，熊彼特在信中写道：“你开始挑剔米塞斯-哈耶克理论的错误，我并不感到惊讶。令我惊讶的是，你竟然喜欢过它。”

²⁵ 正如 Kirzner (1981: 54) 所指出的，米塞斯的批评者“未能认识到……对于米塞斯来说，通过市场价格取得的成果与推动市场竞争的企业家以利润为动力的努力密不可分。”

²⁶ März (1983: 61) 在评论奥地利学派对巴罗内论点的反应时重复了这个神话：“随之而来的是从小冲突中撤退，这不是米塞斯本人所为，而是主要由他的弟子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所为。哈耶克对巴罗内的论点的直接反应是，他认为社会主义共同体具有理论性而非实践性的最佳利用其资源的能力（Was nun folgte, waren Rückzugsgefechte, die allerdings nicht von Mises selbst, sondern hauptsächlich von seinem Jünger, Friedrich von Hayek, bestritten wurden. Die unmittelbare Reaktion Hayeks auf die schon von Barone herrührende Argumentationsführung

始，米塞斯就“绝对没有进行均衡论证”（同上：20）并且对巴罗内的论证没有异议，即就瓦尔拉斯方程组的可解性而言，存在一个“静态条件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形式相似性”（同上：21），但坚持认为“这样的方程不适用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世界”（同上）。在这个意义上，拉沃伊总结道，“哈耶克提出的中心论点……并不构成对米塞斯立场的撤退，而是一种澄清”（同上）。²⁷

如果不是更早的理论基础，最迟是由于社会主义计划体系的崩溃，经济学界对米塞斯-哈耶克论点的看法在此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促使 S. 博姆（S. Böhm, 1990: 231）评论“几十年来对米塞斯的‘不可能论点’的嘲笑突然让位于对其观点的欣赏，就好像它们一直是传统智慧的一部分一样，这真是可耻。”人们现在甚至明确认识到，考虑到熊彼特自己强调持续经济变化的关键作用，熊彼特在静态均衡论点方面，捍卫社会主义立场反对奥地利学派的批评是多么自相矛盾。²⁸因此，P. 萨缪尔森（P. Samuelson）评论道“在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可以玩参数定价游戏的辩论中……熊彼特的最终逻辑应该使他倾向于认为哈耶克最终胜利。”²⁹并且凯泽怀疑——除了他“震惊他的奥地利同事的根深蒂固的欲望”（Keizer 1997: 92）——正是熊彼特“对数理经济学力量的早期信念和他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支持，解释了他使用静态瓦尔拉斯模型来捍卫社会主义免受奥地利学派的动态批评的悖论”（同上：87f.）。³⁰

4.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企业家精神

正如所观察到的，事实上，“米塞斯和熊彼特之间就事实上通往社会主义的趋势达成了某种共识”（Chaloupek 2003: 250）。然而，他们各自对这种趋势的评价却截然不同。虽然米塞斯认为他在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社会主义倾向是错误的社会经济概念和被误导的干预主义政策的致命后果，必须动员健全经济理论的智力力量来反对，但在熊彼特看来，这种趋势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war die, dass er eine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wohl die theoretische, aber nicht die praktische Fähigkeit zusprach, seine Ressourcen optimal einzusetzen”）。”

²⁷ Lavoie (1985: 24) 总结了米塞斯的观点，指出：“企业家市场过程……产生了关于更有效地结合生产要素的方法的知识结构的不断变化。……米塞斯声称，不可能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产生这种知识……市场价格既被视为这种企业家竞争的结果，又被视为……为实现更合理地利用稀缺资源而做出的决定的指南。”

²⁸ 尽管在他的《经济分析史》中 Schumpeter (1954: 987ff.) 中重复了他的论点，为什么根据巴罗内的分析，“就其纯粹的逻辑而言，社会主义计划是有道理的”（同上：989）他在那里补充道更谨慎地说：“我们不能忘记，就像竞争经济的纯理论一样，社会主义的纯理论在非常高的抽象层次上移动，并且证明系统的‘可操作性’比外行所认为（有时理论家也认为）的要少得多。……因为很有可能接受它（巴罗内的结果，V.V.），但仍然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由于所涉及的行政困难或一长串原因中的任何其他原因，“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同上）。

²⁹ 引自 Keizer (1997: 93)。——Böhm (1990: 235) 引用了萨缪尔森的评论，“熊彼特一反常态地认为兰格和勒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是否可能进行理性经济计算的问题上战胜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这一点一反常态。”

³⁰ Keizer (1997: 91): “熊彼特对经济学的最大贡献是他破坏了新古典正统的静态框架。……因此，他用静态的新古典均衡理论为社会主义经济学辩护是自相矛盾的。”

经济科学不需要进行评估，而是需要以超然和公正的方式进行分析。与米塞斯的诊断相反，熊彼特认为这种趋势不是错误政策的结果，而是资本主义发展本身固有的力量的系统结果。在这方面，熊彼特在 1946 年的书评中对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Road to Serfdom*）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但作者研究思想和原则的方式，就好像它们漂浮在空中一样。如果他深入研究那些产生了他非常讨厌的观念的历史条件，他就会发现它们是他所喜欢的社会制度的产物。”³¹

在熊彼特看来，工业和金融集中的明显趋势、大型官僚公司的兴起、管理与所有权的分离、创新和技术变革的常规化以及资本主义体系内的其他发展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基础，正如他所暗示的那样，这种过渡最终只不过是将工业领导层从不再具有相关职能的私人资本所有者的代理人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代理人（Chaloupek 2003: 247; März 1983: 63）。Schumpeter (1950: 186) 甚至断言“解决社会主义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比“实际解决商业管理者所面临的问题”更容易，因为后者必须处理的“关于其实际和潜在竞争对手反应的不确定性”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消失了，在这里管理者可以聚集在一起“采取一致行动”。³²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一下熊彼特关于企业家精神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经济转移的观点，与米塞斯对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功能的理解之间的对比是有益的。正如柯兹纳所怀疑的那样，可能是熊彼特主要关注企业家活动功能³³的“破坏性”或“非均衡”方面，这导致他为企业家精神分配了一个有限的和专业的角色，该角色可以从资本家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而其他人则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熊彼特对企业家活动的性质和重要性的描述，似乎发生了重点的转变，从最初将其描述为竞争性经济的自发动动力，到将其视为一种专门的功能，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在大公司中有条不紊地组织和官僚化，雇佣的“创新专家”也可以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履行这一职能（Böhm 1990: 228）。³⁴

柯兹纳的出版物的一个突出主题，是米塞斯的和熊彼特的企业家之间的比较。与熊彼特强调企业家在通过引发经济向新均衡转变的重大创新扰乱市场过

³¹ 引自 Medearis (2001: 103)。

³² 在脚注中 Schumpeter (1950: 186) 评论了“协同行动”的作用：“就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做法而言，这是迈向社会主义最重要的一步。事实上，它逐步减少了过渡的困难，它本身就是过渡阶段到来的征兆。无条件地反对这种倾向，就等于反对社会主义。”

³³ Kirzner (1981: 53): “对于熊彼特来说，事实上，企业家精神的本质在于它打破现有的均衡状态。”

³⁴ 关于可能发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熊彼特 (1950: 178) 指出，“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成功而言，重要的是它不仅应该尽可能丰富地开展其职业生涯资本主义的前身——有经验和技能，也有资源——而且在后者沉醉于放荡的生活，完成了它的工作并接近静止状态之后。”——正如 Swedberg (1991: 159) 评论的那样：“熊彼特非常强烈地强调社会主义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耗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经济现在由少数大公司组成，它们以非常有效但机械的方式经营一切。企业家变成了普通的管理者，创新主要在大公司内部进行。”

程的常规运作方面的作用³⁵相比，柯兹纳强调，在米塞斯和他自己的理解中，企业家精神³⁶不仅表现在更多“创造性破坏”的壮观行为，更构成了市场过程的本质，其普通功能不亚于更显眼的重大创新实例。³⁷根据柯兹纳（1981: 52）的说法，更广泛的米塞斯企业家精神概念的三个基本方面是，“(a) 承认每个市场参与者的企业家精神；(b) 洞察企业家精神是价格体系内均衡趋势背后的驱动力；(c) 赞赏市场经济实现社会效率的创业基础。”

即使他偶尔会描绘熊彼特的非均衡企业家和米塞斯-柯兹纳的均衡企业家之间的差异，好像它们是相互排斥的观点，³⁸但柯兹纳的意图显然不是否认熊彼特所强调的“创造性破坏”是企业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明确指出，“熊彼特赋予他的企业家的创新角色在更广泛的米塞斯理论中自然地找到了它的位置”（Kirzner 1981: 55）。³⁹相反，他想直接关注的是，仅仅关注“创造性破坏”方面意味着忽略企业家精神在市场过程的正常运作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作用。通过将其重要性降低到创新的英雄行为，这是柯兹纳（1973: 74f.）的批评，熊彼特“助长了相当错误的信念，即企业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对于理解市场趋于均衡位置的方式是不必要的。”它倾向于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在其日常运作中，市场以准自动方式运作，以至于假设它们所执行的功能可以由社会主义管理者和管理者来执行。

基于对普通市场过程的这种理解，可以想象熊彼特的英雄创新者企业家为社会主义经济提供了创造动力，将其转变为新的均衡，就像他以其破坏性的、非平衡的天才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一样。正如柯兹纳（1979: 119）所说，“熊彼特所围绕的企业家精神原则上同样适用于中央计划经济。”根据柯兹纳的说法，熊彼特的描述中缺少的是对这样一个事实的理解，即市场参与者为发现和利用改进机会而进行的日常追求利润的努力提供了保持市场过程正常运转的社

³⁵ 正如 Perlman (2003: 168) 所说，对于熊彼特而言，创新者-企业家角色的特殊意义在于他的，推出了一条如此不同的产品线，从而在市场体系中创造了永久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抹去了之前通过以均衡为中心的价格调整进行市场化的努力。”

³⁶ Böhm (1990: 228) 指出，伊斯雷尔·柯兹纳的工作“代表了米塞斯思想的一致阐述和扩展”，并且“关于米塞斯企业家理论的大部分文献实际上都是对柯兹纳工作的讨论。”

³⁷ Kirzner (1979: 128): “对我们来说，企业家精神在短期运动和长期发展变化中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并且由模仿者行使（他们进入以利用创新者活动所暴露的机会）和创新者自己一样。”

³⁸ 例如，当 Kirzner (1981: 53) 指出米塞斯和熊彼特的立场需要“明确区分”时，当他强调在米塞斯-柯兹纳的观点中“企业家精神是经济中的一种平衡力量”时，我会邀请这样的阅读，而不是相反”（Kirzner 1979: 115），或者当他谈到“熊彼特将企业家视为推动经济远离均衡的自发力量的愿景与（米塞斯-柯兹纳，VV）将企业家视为从不平衡到平衡的过程中的主要代理人”（同上: 112）。——另见 Kirzner (1973: 81)。

³⁹ Kirzner (1981: 54f.) 认为，在米塞斯的观点中，市场过程是由“竞争企业家的以利润为动机的努力驱动的……他们倾向于注意资源在哪里以及如何重新分配到更具社会价值的用途。……正是这样，企业家们除了负责市场中的平衡力量之外，也是‘通往物质进步之路的领导者’。”

会机制，⁴⁰一个事实是米塞斯 (1935: 120) 在指出时强调：“企业家的商业态度和活动源于他在经济过程中的地位，随着其消失而消失。”

5. 结论

理论立场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明显相似或不同，取决于它们所比较的参考标准。与熊彼特和米塞斯在前面部分讨论的问题上的观点之间的差异一样重要的是，当与主流新古典范式进行对比时，两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各自观点之间同样重要的共同点脱颖而出，这些共同点最近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正如凯泽 (1997: 78) 所指出的那样，虽然“熊彼特死后的头二十年普遍认为熊彼特是一个‘非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但事实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他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例如创新的概念、企业家和市场资本主义的活力——具有强烈的‘奥地利学派’风味。”一个人越不重视熊彼特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法（他用自己的演化观破坏了这一理论的基础⁴¹）的悖论性主张，并且越不重视他在社会主义计算问题上的自相矛盾的立场，熊彼特和米塞斯市场过程理论之间的相似之处越突出。⁴²

尤其是伊斯雷尔·柯兹纳评论了最近在评估熊彼特和米塞斯理论观点之间的共性和差异方面的重点转移。虽然根据传统观点，他们的贡献“在精神、目的和方向上有足够的分歧，以至于将他们标记为相距甚远”（Kirzner 1990: 243），但柯兹纳认为，当从二十世纪后期经济学的理论发展的角度来看时，事情似乎有所不同。奥地利学派的复兴以及对熊彼特动态、演化观点的兴趣重新抬头，使人们越来越关注这样一个事实，也就是“奥地利经济理论方法的特征”（即“强调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以及对“对均衡和完全竞争的正统强调”的不满，是被米塞斯和熊彼特等持不同观点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所共同持有的（Kirzner 1979: 3）。从这种世纪后期的角度来看，Kirzner (1990: 244) 认为有理由断言“熊彼特和米塞斯的著作虽然肯定有所不同，但共同构成了在经济学史的一段时期内（在这段时期内这些思想可能已经完全失传了）让奥地利学派的关键思想得以保存和扩展的工具。”

参考文献

⁴⁰ Kirzner (1979: 119): “熊彼特的创新发展图景未能解释的是，存在可能性是不够的，需要一种社会机制来确保感知和接受可能性。熊彼特未能说明非市场经济如何应对这一核心问题。”——Böhm (1990: 229f.) 指出米塞斯的“企业家市场过程观”与他在社会主义计算辩论中的立场的相关性，他指出：“在米塞斯看来，市场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没有提供纠正失调的机制。……熊彼特对这种机制的必要性视而不见。”——正如博姆（同上：229）正确指出的，米塞斯-柯兹纳创业理论的要点“是它渴望超越另一个对企业家角色的看法：它确实是一种关于市场经济应该如何运作的理论。”

⁴¹ Keizer (1997: 92) 指出了自相矛盾的事实，即熊彼特“花费了他的精力来论证他自己的理论已经摧毁的静态均衡理论。”——本着同样的精神，Kirzner (1990: 247) 评论道：“尽管他自己对瓦尔拉斯愿景的迷恋，熊彼特继续强调他对市场动态的欣赏。”

⁴² 在这个意义上，Chaloupek (2003: 257) 指出熊彼特和米塞斯的主要贡献“并不矛盾，而是互补。”——另见 Böhm (1990: 203)。

Allen, Robert Loring 1991: *Opening Doors – The Life and Work of Joseph Schumpeter*, Vol. One, Europe, New Brunswick and London: Transaction Publishers.

Böhm, Stephan 1990: “The Austrian Tradition: Schumpeter and Mises,” in: Hennings, Klaus and Warren J. Samuels (eds.) 1990: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1870 to 1930*,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01-241.

Caldwell, Bruce 1997: “Introduction,” in: F. A. Hayek, *Socialism and War. Essays, Documents, Reviews*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X),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50.

Chaloupek, Günther 2003: “The Second Cleavage of the Austrian School: Schumpeter’s German Writings on Economic Systems and Economic Policy in Comparison with Mises/Hayek,” in: J. Backhaus (ed.), *Joseph Schumpeter*,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45-260.

Festré, Agnes 2002: “Money, Banking and Dynamics: The Wicksellian Routes from Mises to Hayek and Schumpeter,”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1, 439-480.

Hayek, F.A. (ed.) 1935: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Hayek, F.A. 1948: “The Use of Knowledge in Society,” in: F.A. Hayek, *Individualism and Economic Order*,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7-91.

Hayek, F.A. 1992: *The Fortunes of Liberalism – Essays on Austrian Economics and the Ideal of Freedom* (The Collected Works of F.A. Hayek, Vol. IV),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ébert, Robert F. 1990: “Commentary,” in: Hennings & Samuels (eds.) 1990, 190-200.

Keizer, Willem 1997: “Schumpeter’s Walrasian Stand in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in: W. Keizer, B. Tieben and R. van Zijp (eds.), *Austrian Economics in Deb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75-94.

Kirzner, Israel M. 1973: *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zner, Israel M. 1976: *The Economic Point of View – An Essay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Kansas City: Sheed and Ward.

Kirzner, Israel M. 1979: *Perception, Opportunity, and Profit –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ntrepreneurship*,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irzner, Israel M. 1981: “Mises on Entrepreneurship,” *Wirtschaftspolitische Blätter* 28, 51- 57.

Kirzner, Israel M. 1990: "Commentary," in: Hennings, Klaus and Warren J. Samuels (eds.) 1990: *Neo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1870 to 1930*,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242-249.

Lavoie, Don 1985: *Rivalry and central planning.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 reconsidered*, Cambridge et 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März, Eduard 1983: *Joseph Alois Schumpeter – Forscher, Lehrer und Politiker*, München: R. Oldenbourg Verlag.

Medearis, John 2001: *Joseph Schumpeter's Two Theorie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ises, Ludwig von 1920: "Die Wirtschaftsrechnung im sozialistischen Gemeinwesen,"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7, 86-120.

Mises, Ludwig von 1923: "Neue Beiträge zum Problem der sozialistischen Wirtschaftsrechnung,"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51, 488-500.

Mises, Ludwig von 1935: "Economic Calculation in the Socialist Commonwealth," in: F.A. Hayek (ed.), *Collectivist Economic Planning*,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87-130.

Mises, Ludwig von 1949: *Human Action – A Treatise on Economic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Mises, Ludwig von 1978a: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South Holland, Ill.: Libertarian Press. Mises, Ludwig von 1978b: *The Ultimate Foundations of Economic Science – An Essay on Method*, 2nd ed., Kansas City: Sheed Andrews and McMeel.

Mises, Ludwig von 1990: *Money, Method, and the Market Process*, Essays by Ludwig von Mises, Selected by Margit von Mises,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M. Ebeling, Norwell, Mas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Mises, Ludwig von 2002: *Selected Writings of Ludwig von Mises. Between the Two World Wars: Monetary Disorder, Interventionism, Socialism,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ed. by R.M. Ebeling,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Perlman, Mark 2003: "Schumpeter and Schools of Economic Thought," in: J. Backhaus (ed.), *Alois Schumpeter*, Boston, Dordrecht, 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63-178.

Salerno, Joseph T. 1999: "The Place of Mises's *Human Ac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conomic Thought,"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 2, 35-65.

Schumpeter, Joseph 1908: *Das Wesen und der Hauptinhalt der theoretischen Nationalökonomie*,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Schumpeter, Joseph A. 1921: "Sozialistische Möglichkeiten von heute,"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48, 305-360.

Schumpeter, Joseph A. 1950 (orig.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et al.: Harper & Row.

Schumpeter, Joseph A. 1954: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chumpeter, Joseph A. 1970: *Das Wesen des Gelde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Swedberg, Richard 1991: *Joseph A. Schumpeter – His Life and Work*, Cambridge: Polity Press.

Vanberg, Viktor 1975: *Die zwei Soziologien. Individualismus und Kollektivismus in der Sozialtheorie*, Tübingen: J.C.B. Mohr (Paul Siebeck).

Vanberg, Viktor J. 2004: "Austrian Economics,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Methodological Dualism: Subjectivism Reconsidered," *Advances in Austrian Economics* 7 (on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and Economic Theory*, ed. By R. Koppl), 155-199.